

破除旧樊篱,走向新时代

——2017年中国文论前沿的一种考察

刘志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720)

[摘要] 2017年,中国文学理论可谓在“破旧”与“立新”中迎接着新时代的来临:一方面是辨明和破除中西二元对立观念、强制阐释等壁垒,一方面是呼吁和践行在对话中发展文论与文化,提出公共阐释的理论框架。同时,弘扬传统美学精神、发掘古代文论资源,从社会文化理论的多元视角研究文学,也使中国文论的建构与发展植根于开阔的学术沃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应该坚信当代中国文化的本位价值,坚信传统文化的根源价值,坚信外来文化的对话价值,以开放多元的理论品格,建构新时代的中国文论。

[关键词] 中国文论; 中西二元对立; 对话; 公共阐释学; 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IO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8)02-0105-08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方案^[1]。这宣告中国国家、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2017年,中国文学理论可谓在“破旧”与“立新”中迎接着新时代的来临。如果说,经过多年探索,辨明中西二元对立观念的是非、在对话中发展理论与文化的呼吁和实践,唱响了新时代中国文论的前奏,那么,在破除强制阐释、理论中心等枷锁之后,公共阐释学的提出则迈出了建构中国文论的新步伐;如果说,弘扬传统美学精神、发掘古代文论资源,让中国文论的建构有源可溯、有根可寻,那么,从社会文化理论的多元视角研究文学,则将中国文论的发展植根于开阔的学术沃土。

一 破除中西二元对立思维,在对话中发展中国文论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当下,通过对话和交往来坚持和发展文化的多样性已是不可扭转的历史趋势。如何认识和处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必要而又在争论中历久弥新的问题。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学理论,都无法脱离这一历史洪流而独处。

金惠敏在审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文化问题时深刻地洞察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核心问题

是中西方的关系问题,而人们往往以二元对立思维来认识和处理这一关系。他指出:“中西文化二元对立思维是一种将中华文化仅仅限制在特殊性层次上的思维,而不知道既往的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即是说,不知道中华文化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西文化二元对立思维是自我矮化的思维,不仅妨碍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作用的发挥,也阻碍我们生活于其中并不断对之加以创新的当代文化对全球文化的建构。”^[2]

这不是否定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而是强调特殊性、普遍性兼顾并举,因为绝对的特殊性无异于自我封闭、自动出局,无异于自我矮化、自行遮蔽。历史地看,二元对立的思维或者观念并非一无是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在致力人民解放的战争年代,强调对立、明确对象、强化自我,是无可厚非的,即使有时言语和行动偏激,亦在情理之中。问题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地思考这个时代的各种问题,不能与日俱新地构想这个时代的发展前景,只是株守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观念、某些记忆、某些情绪,那就无异于开了历史的倒车。这样的思维或者观念,不符合我们的国情,也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更谈不上文化自信了。

深感破除当下中西二元对立惯性思维之紧要,《中国图书评论》刊载了金惠敏发起的一组讨论文章。关于如何破解二元对立思维,易晓明认为,麦克

[收稿日期] 2018-01-22

[作者简介] 刘志兵(1980-),男,吉林双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

卢汉的边疆理论提供了有效路径^[3];张聪认为,要着重处理好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4];高丽萍认为,后殖民理论中的抵抗和对话思想可资借鉴^[5];刘宝认为,“文化星丛”,也就是文化多样性是一条出路^[6]。

实际上,如何破除中西文化二元对立思维,是近些年来金惠敏一直倾力探索的问题。从“全球对话主义”到“价值星丛”论,再到“差异”话语,在建构当代世界文学文化理论话语的同时,无不蕴藏着批判和破除中西二元对立思维的努力。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味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不可通约性,自行绑缚在弱势、另类 and 边缘的位置上,不仅不合时宜,而且碍于参与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因此,各种价值符号之间动态对话,在正视差异的同时互相界定和阐释,如同星丛那样彼此探照、平等相处、“和而不同”,也就成了必要之举^①。

金惠敏指出,与那些“扎篱笆、砌围墙、拒世界文化于国门之外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不同,中国建构的是以“和而不同”为旨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的目标是顺应全球化的客观大势,做全球化的捍卫者和引领者,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而是一个被重新界定了的共同体,即一个被星丛化了的共同体。在其中,我们敬重差异,敬畏差异,与差异始终保持不即不离的间距,坚信:第一,差异是世界的本来面貌和本体论特征;第二,差异是人类进步或文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第三,差异使世界丰富多彩,使世界充满了意趣和意义。”^[7]

中西二元对立思维,不只是中西文化主体间的对立问题,还存在着一个时间维度,也是传统与当代的中西文化关系问题。金惠敏在深入解读习近平“当代文化”和“现实文化”两个概念的基础上指出,发展中国当代文化,必须坚持我们自己的现实本位立场,无论古今、不分中西,都可以将其作为资源加以使用,通过实践检验其效价^[8]。南帆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引进西方的各种理论,是为了再现和阐释“中国经验”及其意义,而不是反过来将“中国经验”作为例证,这样才能保持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9]。也就是说,西方的理论是可以拿来使用或者借鉴的,但必须根植于中国大地,根植于中国的现实生活。李春青考察了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及其历史演变,认为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相通性,这就为中西文论对话提供了可能性^[10]。曹顺庆将中西文论对话看作促成中国话语建设的新路径:以中国古代文论为理论支点,以西方文论为当下

语境,既求同又辨异^[11]。

正是深切认识到对话之可能性与必要性,中外文论的比较仍然是本年度的热点话题。我们认为,比较本身就预设了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共在关系。因为只有差异没有同一,就无法比较;只有同一没有差异,也无须比较。所谓比较,就是求同存异,也就是对话。

《文艺争鸣》刊发了一组讨论“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的理论文章。在宗旨和原则问题上,朱立元认为,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研究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程^[12]。韩经太指出,当下“中”“西”跨文化视域下的关键词比较研究,核心价值在于建构当代文学理论体系^[13]。张政文论述了进行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建构当代中国文论需要坚持的若干原则,强调必须“以我为主”,注重本土化和当代化^[14]。

在方法问题上,李春青强调,关键词的选择要注意其可比性,也就是差异性、相似性共存并保持某种平衡,关键词的比较要深入文化系统的深层和复杂的关联性之中^[15]。罗剑波批评了将中西文论的差异绝对化进而拒绝对话的观点,认为关键词方法论为中西文论比较提供了理念、维度及限度上的基本依据,强调关键词比较要有语境意识、历史意识,必须有差异地建构并回答“中国问题”^[16]。张晶指出,应该选择那些代表中华美学根本观念,具有强劲辐射力、衍生力、生命力的词语作为比较对象^[17]。段吉方认为,关键词研究在方法上以词带论、以词考论、以词论辩,主旨是呈现词语背后的思想和文化^[18]。

在实践层面,一些学者就中西文论中的某些关键词做出了比较。《学术研究》开设“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研究”专栏,本年度第1-8期皆有专题论文发表。例如,胡亚敏、刘知萌将中西文论的“空白”概念做比较,阐述了中西方“空白”概念的同中之异,认为这种差异根本上源自中西宇宙观的差异,即“无”与“being”(有)之间的差异^[19]。曹顺庆、林家钊比较了中西的“语言”与“意义”这对范畴,认为中西在语言本质观、语言生成意义的方式及效果方面均呈现出相似又相异之处^[20]。刘方喜则通过比较“体用”与“本体”两个范畴,阐发了关键词比较对于弱化中西二元对立思维、推动中国当代文论系统发育的重要意义^[21]。如此等等,不再一一列举。

在比较的视野中,关于文学理论一些基本问题的讨论得以继续和深化。例如,王元骧在比较分析认识论、表现论、存在论、形式论四种主要文艺观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也就是把反

映论与实践论结合起来,最能洞察文学审美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本质特征^[22]。姚新勇、刘亚娟回顾了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的构建过程,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思考了少数民族文论乃至中国文论的发展问题^[23]。另外,关于“世界文学”概念的争论,仍在进行之中^②。

二 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建构新文论的中国方案

近年来,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关于“强制阐释”“理论中心”“作者意图”的对话和讨论持续进行^③。继而,张江又发起关于阐释的边界的讨论:阐释到底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到底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

张江以安贝托·艾柯两部著作中所反映出的看似矛盾的观点为例说明,文本既是自在的,也是开放的,我们既不能否认文本自身所蕴含的有限的确定意义,也不能否认理解者的合理阐释与发挥。因此,需要“在确定与非确定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将阐释展开于两者相互冲突的张力之间。各自的立场都应该得到尊重,无须对具体文本阐释过程中各个方向有限的过度夸张加以过度责难”^[24]。

张江发起的讨论引起学术界的热切回应,《文艺争鸣》刊发了一组探讨“阐释的边界”的笔谈文章^④。正如陆扬所指出的,张江的结论虽然呼应了之前的强制阐释批判立场,不过已经显得相当温和^[25]。宋伟认为,张江的结论体现出“辩证阐释学”的理论意向,反映了“悖论存在”的生存本体论事实。由此,阐释学有可能从认识论、知识论或逻辑学的框架中解放出来^[26]。谭好哲充分肯定批判强制阐释对于建设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意义,同时认为有必要对强制阐释“场外征用”和“主观预设”两个特征做进一步分析。他认为,脱离文学实践和阐释对象而强制征用固然不对,但并非一切征用都要排斥和否定,要区别对待原生理论和次生理论。作为一个否定性理论命题,“前置立场”“前置模式”的界说不能涵盖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部情况,应做具体分析。总之,要进一步厘定界限^[27]。

我们看到,关于强制阐释、阐释边界的讨论不局限于文学领域,而是延展到历史学、量子力学等领域,成了一个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张江通过辨析20世纪的量子力学,特别是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指出,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以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为标志,当代一些社会与人文理论,出现了否定人类理性和认识的真实性追求的趋势。它们否定对历史、文学、社会等各类现实与非现实文本的确定性阐释,以去中心、去本质、去客观化、片面推崇理解

和阐释的无限开放与任意结果为主潮,呈现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倾向^[28]。

强制阐释批判明确反对的是不顾作者的意图、文本的自在性,而将任意阐释发展到极端的做法,明确反对的是绝对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的理论倾向^[29],强调阐释要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必须以确定性、真实性追求为己任。尽管阐释的边界处于变动之中,但是,通过对话讨论达成基本共识,也就是说,获得对文本大致相同的理解与认识,是可能的^[30]。

强制阐释批判由此转向了阐释学的建构。接下来的问题便是,阐释如果确有边界的话,到底在哪里呢?这个限度到底如何界定呢?我们应该建构什么样的当代中国阐释学呢?于是,“公共阐释”作为一个核心范畴被提了出来。

张江认为,公共性而非私人性,是阐释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公共性就是阐释的限度或者边界,阐释即公共阐释。所谓公共阐释,是指“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公共阐释具有六个特征:一是理性,二是澄明性,三是公度性,四是建构性,五是超越性,六是反思性。公共阐释,强调理性的主导作用,但不否认非理性可以参与其中;强调文本的意义可以渐次为公众所理解,但不否定文本的自在性;强调阐释活动各要素之间是能够互相通达、取得基本共识的;强调阐释活动致力于公共理性、公共视域、公共理解的建构;强调个体阐释必须在人类共在、集体经验、公共语言和确定语境四个维度上接受公共阐释的约束,个体阐释只有上升为公共阐释,也就是只有以公共效果才能进入历史,但不否认个体阐释的原初性,因为阐释的公共性本身就隐含了公共场域中各类阐释的多元共存;强调在对话交流中,不断反思、改进和更新自身^[31]。

关于公共阐释,张江与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次对话和交流。迈克·费瑟斯通在肯定公共阐释的意义的同时,指出当下达成公共阐释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他认为,制约和影响公共言说、公共对话、公共辩论,也就是阐释的公共性的主要因素,一是经济社会关系、话语权力对于公开竞争的限制,二是社会体制、文化传统对于个体言说的规约,三是媒介所具有的“修辞力量”对于公共真理的遮蔽^[32]。

如果说,张江与迈克·费瑟斯通之间的对话聚焦于阐释的“公共性”何以可能这个问题,那么,张江与约翰·汤普森之间的对话则围绕阐释的本质到底是“公共”的还是“社会”的这个问题而展开。约翰·汤普森赞同公共阐释学的核心观点。进一步

地,他立足于阐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世界的日常生活的学问,强调阐释不仅是公共的,也具有冲突性,因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多样的,本来就存在着竞争或者斗争。他提议把阐释学带入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来,因为阐释是象征性权力的展现,阐释和阐释学总是与权力、利益及冲突等纠缠或捆绑在一起的。总之,公共阐释是相对于私人阐释而言的,本质上就是“社会阐释”。张江认同公共阐释首先应该立足于日常的公共生活,但认为阐释要经历一个由个人阐释到社会阐释,再由社会阐释上升为公共阐释的过程。阐释已经成为一种对话,成为一种互动过程^[33]。

综上所述,公共阐释具有广泛的现实适用性,是一个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将公共性作为阐释的本质特征旨在强调,在普遍的社会历史前提下,多元的阐释主体在多次的对话和反思中,可以就文本的意义不断达成基本共识。和一般的方法论、本体论(存在论)的阐释学不同,公共阐释学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公共价值取向。我们由此可以说,公共阐释学致力于建构一种对话阐释学,它和冲突性、对抗性的对话阐释学不同,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对话阐释学。当然,公共阐释学要从“论纲”发展成学说或者理论,势必对其基本问题做出更加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建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离不开对文论基本问题的阐释。从公共阐释的角度看,一个时期对于某个问题的公共阐释在另一个时期可能成为私人阐释,这体现了公共阐释的超越性与反思性,或者说,变动性与复杂性。

例如,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说”自提出四十多年来响应者甚众,堪称一种对于中国文学特质的公共性阐释,但是,也有一些批评乃至否定的声音。李春青在归纳了龚鹏程对该说的批评(如方法及范畴上的错乱,“以西律中”,混淆中西“抒情”的不同含义等)后,进一步指出该说的谬误之处:以“抒情”来标示几千年的中国文学传统具有明显的“本质主义”倾向,缺乏历史的视野,并且对中国哲学与艺术历史演变轨迹之原因的分析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归纳起来,可称之为“具体性误置”。李春青认为,阐释中国文学传统,要坚持历史化、语境化的思维方式,要从主体的视角来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的文学实际,借鉴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最终要“别立新宗”^[34]。这样,不仅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之阐释的公共性提出了质疑,而且进行了反思性阐释的尝试,在对话中推进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传统及其特质的认识。

再如,关于文学的“本质”问题,赖大仁描述了当代中国,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学本质论观念从社会意识形态论到审美意识形态论,从审美论到人的文学论,乃至在反本质主义语境下重新探讨的历史嬗变,并反思了当下文学本质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35]。王坤认为,反本质主义的成功之处在于,以建构论消解本质论的僵化或固化对象的弊病。但是,建构论真正要消解的还是本质论的先存性及其背后的自然本体论。反本质主义必须解决以差异性消解同一性的问题^[36]。

对于文学基本问题的研究,是常在常新的。理论的阐释没有完成时,只有与时俱进、与日俱新而已。

三 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服务当代中国文论建设

我们不仅要通过比较和对话来破除中西二元对立的壁垒,借鉴和吸收外国文化这个“外来”,还要通过发掘和阐释,激活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这个“本来”,最终的落脚点是面向“未来”建构当代中国文化。因此,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建构当代中国文化、文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而理解和阐释传统文化、文论的涵义和精神又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前提性条件。

2017年,《中国文学批评》继续设立“中华美学精神”专栏,其他报刊也不时地刊发或者组织撰写相关的专题论文^⑤。综合地看,本年度刊发的相关论文大致可分成以下几类。

一是从文化源头或者本质特征方面进行研究。例如,杨春时从发生条件、提问方式、论说方式和理论形态四个角度考察了中华美学思想的根源^[37]。陈望衡认为,“家—国”意识对于中华审美概念系统的建构、审美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家国情怀催生出兴亡、气节、羁旅、江山等文学母题^[38]。周代的思想和文化对孔子本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韩仪对有周一代的诗学思想及审美标准做了研究^[39],陈丽丽则以《周易》为核心,探究了“生生”“观物取象”“阴阳”“天人感应”等思想对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影响^[40]。古风通过中西比较,分析了中国美学的七个主要特色,认为西方美学立根于“感性”,却又背离了“感性”而追求“理性”,中国美学则不仅立根于“感性”,而且坚守了“感性”,是真正意义上的“感性学”^[41]。

二是从核心范畴或者关键词方面进行研究。由于中华美学的相关文献常见于文论、诗论、书论、画论等之中,因此,文论关键词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相关的美学范畴,反之亦然。例如,王昌忠回到具体的

历史语境,考察、辨析“审美”概念的历史沿革及其意义,透视了百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42]。杨星映对“气”的形态及其在艺术中的表现做了系统而细致的描述^[43]。冀志强辨析了意象与美两个范畴之间的差异^[44]。

三是从不同时代、地域和民族特征方面进行研究。例如,李天道、魏春艳认为,受巴蜀文化中通达开放的地域文化心态的影响,司马相如的赋作蕴藉着一种开放的美学精神^[45]。刘启涛、王琨、李骞认为,当代大凉山彝族汉语诗歌中最常见的原生态意象彰显了丰富的文化基因和质朴的生态美学精神,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边缘活力”^[46]。

四是从具体的审美领域或者器物方面进行研究。例如,毛宣国把书法看作一门最能体现中华美学精神的艺术,认为汉字的结构与诗化能够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征^[47]。曾繁仁认为,中国书法以其独特之美彪炳于世,即独特的线条艺术、笔墨走势、生命韵律、风格特征和文化内涵^[48]。史红将中国服饰的主要美学特点归结为由自我约束的价值取向所构成的审美意象,由权力、等级与秩序所建立的严格的审美规范,由不同理念、趣味所导致的对立的审美风格,由“天人合一”法则所呈现的自然合理的审美存在^[49]。易冬冬认为,从美学和艺术的角度审视中国传统礼文化的要义在于,将礼看作一种以行礼之人为核心的综合性的、具有演剧性质的典礼艺术^[50]。

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从宏观层面把握中华美学的主旨精神、源流发展、差异特征,有助于我们从中观层面理解中华美学的核心范畴及其时代、地域、民族特征,有助于我们从微观层面体认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中华美学精神。微观层面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活生生的联系,这是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有力支点和重要动力。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对于传统文化,不仅要理解传承,还要阐发激活,将其带入建构当代中国文化的对话和实践之中。关于传统美学、古代文论与当代美学、文论的发展问题,高建平强调,要汲取传统美学的精华,在当下文化和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出既具当代性又具中国特点的美学^[51]。朱志荣认为,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性具体表现为独创性、开放性、与时俱进和面向世界等,是在学习西方美学观念和方法、适应当代审美实践、保留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符合全球化时代审美实践和理论建构的需要^[52]。曾繁仁把中西对话看作中国生态美学发展创新的有效路径,并具体分析了这种对话的动因、文化根基、主题、哲学内涵、话语方式和艺术实践等问

题^[53]。陈雪虎将百年来的古代文论研究概括为“史”“论”和“释”三种主要方法:“史”的做法侧重于历时维度的连续性或非连续性,“论”的做法侧重于整体逻辑或内在结构,而“释”的做法侧重于同当代主体的对话关系,三者虽各有侧重,却互相补充,甚至浑而为一^[54]。毛宣国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指古代文论资源“进入”当代文论中,以有利于当代文论的创新与发展^[55]。潘链钰建议从返道、立本、致用、诗性四个方面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56]。

在当代中国美学家思想研究方面,《文艺争鸣》继续开设“重构中国美学精神”专栏,推出了研究宗白华美学思想、李泽厚哲学美学思想的专题文章^⑥。2017年是宗白华诞辰120周年,《中国图书评论》也刊发了一组研讨宗白华美学精神的文章^⑦。

我们看到,从古代到现当代,从理解阐释到传承发展,关于中国传统美学、文论的持续讨论显示出令人欣喜的发展态势。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创造了灿烂多姿的思想和文化,这些都是当下社会文化发展的根脉源泉。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就是“通古今之变”,就是实现中国文化的古今对话,进而强化当代文化对自身历史的自觉与自信。

四 拓宽社会文化多元视野,建构开放的中国文艺学

正如南帆所指出的,文学理论在与诸多学科的紧张对话中,“置身于共时的文化结构空间,并且在文化结构多重压力的敦促之下不断地从事自我调整。具体地说,文学理论即是在紧张的对话关系之中显示了聚焦的范围和对象”^[57]⁹⁹。尽管每个时代的文学理论所聚焦和解答的问题不尽相同,但不容置疑的是,文学理论离不开社会文化这个大集体。当下,对于文学的理论把握,专业化、领域化的研究是一种方式,但更要有一种开阔的社会文化理论视野,才不至于偏执一端。这是现实的必然要求,也是理论应有的气度。

当代社会,媒介技术的变革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停地塑造着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方式。通过语言声音图像等各种符号塑造形象、表达意义的文学艺术不能脱离这一境遇。那么,媒介技术的变革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文化感知,包括审美感知的呢?

文化的视觉性、听觉性乃至触觉性,可称之为文化的感性学问题,仍然是学术界重点关注所在。周宪认为,在“世界被把握为图像”的时代,视觉文化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主导形态。视觉文化是一种表

意实践,从编码到解码,从实在物到概念再到符号,充满了差异和变化。他将中国当代视觉文化划分为主流、大众和精英三种亚文化类型,认为主导性、娱乐性和批判性三种“看之方式”的互动,构成了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的协商性动态结构^[58]。周志强认为,在消费主义文化政治逻辑主导下的时代,“倾听”是一个被声音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产物。现代声音技术以其独特而有效的编码逻辑,逐渐“摆脱”其场所和空间的限定,使声音变成“纯粹的能指”,变成人们用内心生活代替现实境遇的方式^[59]。刘连杰认为,在视觉文化霸权不断扩张“之后”,用听觉文化来替代视觉文化并未跳出西方传统思维模式。相比于视觉文化和听觉文化,触觉文化具有更强的自我反思能力,更不容易形成专制主义,并呼应了当代文化的身体转向,因此具有更积极的时代意义和更广阔的发展前景^[60]。

媒介技术的变革不仅影响着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动向,而且生发出建构文艺学、美学新的理论增长点。

例如,关于媒介技术影响下的文艺批评问题,单小曦在“新媒介文艺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媒介文艺批评”的主张,提出了不同于模仿说、实用(接受)说、表现说、客观说等传统文艺观的“媒介说”,其具体内涵有“文艺即媒介工具”“文艺即媒介程序”“文艺即媒介实践”“文艺即存在显现的媒介场域”等^[61]。欧阳友权、喻蕾针对网络文学批评的历史书写问题,分析了网络文学批评在观念、标准、功能、主体和影响力方面的变化^[62]。陈定家认为,在工具理性与技术逻辑所主宰的新媒介文化语境中,网络写作者渐渐弱化了诗性智慧与审美意味的感知能力,新媒介文化批评也相应陷入标准混乱、价值迷失的困境之中,新媒介文化的价值导向研究和健康向上的批评引导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63]。

再如,关于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当代美学的建构问题,陈海认为,数字技术极大地改变了自然、社会和艺术的存在状况,当代美学应该通过跨学科研究、吸收媒介生态学等媒介技术理论成果,来获取新的视野^[64]。牛鸿英则对虚拟现实技术生成的审美体验做了具体分析,倡导以此“活化”华夏审美体验,以传统审美的超越精神促进全球公共美学的生成与升级^[65]。

另外,《文艺理论研究》刊发了研究“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专题文章。实际上,这些看似与“文学”理论关系不甚密切的文化理论、社会理论,是渗透在文学“理论”的细胞之内的。因为理论向来与现实共在同行,文学与社会、文化尚不可剥离,

焉有将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社会理论等相隔离之理?

在全球化时代,在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我们不应该因为自己通晓外来文化而自责,一个没有开阔视野、包容意识和宽广胸怀的民族何以创造出世界意义的文化?我们所要做的,不是丢弃以巨大代价换来的对外来文化的认知,也不是走到食古不化的老路上去,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复古”,也没有什么纯粹的“外化”,因为我们的现实本位始终存在且生生不已。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所坚持的应是,真正舍弃各种形式的自卑和自大心态,坚信当代中国文化的本位价值,坚信传统文化的根源价值,坚信外来文化的对话价值,以开放多元的理论品格,建构新时代的中国文论。

注释:

①参见金惠敏《价值星丛——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理论出路》《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7期,第59-62页;《差异即对话:一份研究纲领》《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4期,第60-72页。

②参见方维规《何谓世界文学?》(《文艺研究》2017年第1期)、杨慧林《“世界文学”何以“发生”:比较文学的人文学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和曹顺庆、齐思原《争议中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概念的反思》(《文艺争鸣》2017年第6期)等文。

③《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开设“‘意图’与‘阐释’的讨论”专栏,于第2、4、6、8、10、12期陆续刊发多篇专题论文。此外,还有张江、本尼特、罗伊尔、莫德、博斯托克《意图岂能成为谬误——张江与本尼特、罗伊尔、莫德、博斯托克英国对话录》(《学术研究》2017年第4期),张隆溪《过度阐释与文学研究的未来——读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和王元骧《读张江〈理论中心论〉所想到的》(《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等文。

④这组文章发表于《文艺争鸣》2017年第11期,除本自然段下面所提及的几位学者的文章外,还包括赖大仁《文学批评阐释的有效性及其限度——从一个文学批评阐释之例说起》、赵炎秋《阐释边界的确定与开放》、丁国旗《阐释的“界”线——从盲人摸象谈起》、刘方喜《“意无穷”不是“坏无限”——也谈意义的开放性》和潘雯《理论的封闭与开放:兼论如何理解“东方主义”》等文。

⑤例如,《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刊发了一组以“论中华美学的传承与创新”为主题的文章,包括刘纲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高建平《美学的世界与世界的美学:走出“冲击与反应”模式》、张法《中华美学在当前三个重要课题》、薛富兴《发扬“诗教”传统 提倡普遍意识》、刘成纪《中国美学研究亟待重回中国历史本身》、刘悦笛《以“生活美学”反本开新出“大传统”》、彭修银《当下民族美学话语建构的迷行性及其问题》和吴海伦《中

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等文。

⑥探讨宗白华美学思想的专题文章发表于《文艺争鸣》2017年第3期,包括王岳川《宗白华的散步美学境界》、彭锋《气韵与光影——兼谈宗白华的中国现代美学建构方式》、王德胜《阐扬生命运动表现的理论——宗白华艺术审美理论中的“动”》、汤拥华《宗白华与“中国形上学”的难题》和唐善林《“生命的律动”——宗白华“六法”绘画美学思想探微》等文。探讨李泽厚哲学美学思想的专题文章发表于《文艺争鸣》2017年第5期,包括刘悦笛《实践哲学与美学来源的真正钥匙——新发现的李泽厚〈六十年代残稿〉初步研究》、宋伟《李泽厚与刘再复:“主体性哲学”与“文学主体性”》、张宝贵《本体论的生活美学——杜威与李泽厚思想比照》、陈岸瑛《从朱光潜到李泽厚——如何建构后美学时代的中国本土艺术哲学》和李伟《推动李泽厚对“工具本体”之未受重视的抱怨——以李泽厚同康德和马克思之关系为中心》等文。

⑦这组文章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12期,包括童强《拯救感性:宗白华美学精神在今天的启示》、汪涤《宗白华美学与中西造型艺术》、黄积鑫《关于书法理论研究的反思——以宗白华为线索》和张生《努力创造我们的技术——宗白华的技术观》等文。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11.
- [2] 金惠敏.关于中西文化二元对立观念的讨论[J].中国图书评论,2017(7):18-19.
- [3] 易晓明.边疆理论对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超越[J].中国图书评论,2017(7):20-23.
- [4] 张聪.特殊与普遍之辨——也论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J].中国图书评论,2017(7):24-29.
- [5] 高丽萍.从对抗到对话——摆脱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后殖民主义启示[J].中国图书评论,2017(7):30-33.
- [6] 刘宝.文化与“文化星丛”[J].中国图书评论,2017(7):34-39.
- [7] 金惠敏.文化自信与星丛共同体[J].哲学研究,2017(4):119-126.
- [8] 金惠敏.作为话语的文化与作为生命的实践——习近平“当代文化”和“现实文化”两个概念对于破除中西文化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意义[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7(3):5-15.
- [9] 南帆.文学理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性[J].文艺理论研究,2017(3):6-16.
- [10] 李春青.在“体认”与“默会”之间——论中西文论思维方式的差异与趋同[J].社会科学战线,2017(1):117-134.
- [11] 曹顺庆.中国话语建设的新路径——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的对话[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118-12.
- [12] 朱立元.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基础工程[J].文艺争鸣,2017(1):15-17.
- [13] 韩经太.文学理论关键词研究的核心价值问题导向[J].文艺争鸣,2017(1):18-20.
- [14] 张政文.当代中国文论“关键词”构建的基本途径[J].文艺争鸣,2017(1):24-27.
- [15] 李春青.浅谈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的意义与方法[J].文艺争鸣,2017(1):28-31.
- [16] 罗剑波.问题导向与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J].文艺争鸣,2017(1):45-47.
- [17] 张晶.中西文论关键词研究之浅思[J].文艺争鸣,2017(1):32-34.
- [18] 段吉方.作为文化批评传统的文论关键词研究[J].文艺争鸣,2017(1):42-44.
- [19] 胡亚敏,刘知萌.中西“空白”概念比较研究[J].学术研究,2017(1):14.
- [20] 曹顺庆,林家钊.语言与意义——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J].学术研究,2017(2):1-8.
- [21] 刘方喜.体用不二:在“词语的旅行”中重建文学本体论关联——谈关键词比较研究对于文论系统发育的意义[J].文艺争鸣,2017(1):35-37.
- [22] 王元骧.反映论文艺观:我的选择和反思[J].中国文学批评,2017(2):32-38.
- [23] 姚新勇,刘亚娟.少数民族文论的困境与中国文论“失语症”连带[J].文艺理论研究,2017(1):35-46.
- [24] 张江.开放与封闭——阐释的边界讨论之一[J].文艺争鸣,2017(1):6-14.
- [25] 陆扬.艾柯的困顿[J].文艺争鸣,2017(11):111-114.
- [26] 宋伟.艾柯反对艾柯——阐释的悖论与辩证的阐释[J].文艺争鸣,2017(11):120-122.
- [27] 谭好哲.“强制阐释论”系列研究的理论建构意义——兼就几个问题做进一步商讨[J].文艺争鸣,2017(11):123-128.
- [28] 张江.不确定关系的确定性——阐释的边界讨论之二[J].学术月刊,2017(6):120-130.
- [29] 张江.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兼论相对主义的历史阐释[J].历史研究,2017(1):4-21.
- [30] 张江,伊拉莎白·梅内迪,马丽娜·伯恩蒂,凯撒·贾科巴齐.文本的角色——关于强制阐释的对话[J].文艺研究,2017(6):75-81.
- [31] 张江.公共阐释论纲[J].学术研究,2017(6):1-5.
- [32] 张江,[英]迈克·费瑟斯通.作为一种公共行为的阐释——张江与迈克·费瑟斯通的对话[J].学术研究,2017(11):1-9.
- [33] 张江,[英]约翰·汤普森.公共阐释还是社会阐释——张江与约翰·汤普森的对话[J].学术研究,2017(11):9-16.
- [34] 李春青.论“中国的抒情传统”说之得失——兼谈考量中国文学传统的标准与方法问题[J].文学评论,2017(4):51-60.
- [35] 赖大仁.文学本质论观念的历史嬗变及其反思[J].文艺理论研究,2017(1):18-26.

- [36] 王坤.反本质主义和本体论学理问题——西方文论中国化重点个案研究之一[J].学术研究,2017(9):159-167.
- [37] 杨春时.中华美学思想的建构探源[J].文艺争鸣,2017(8):100-106.
- [38] 陈望衡.中华美学的“家—国”意识[J].文学评论,2017(5):37-43.
- [39] 韩仪.论周代的诗学思想及审美标准[J].中国文学批评,2017(2):63-71.
- [40] 陈丽丽.《周易》对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影响[J].中国文学批评,2017(1):60-69.
- [41] 古风.从比较视域看中国美学的基本特色[J].中国文学批评,2017(3):13-19.
- [42] 王昌忠.百年中国“审美”概念的历史沿革及其意义[J].文学评论,2017(1):103-110.
- [43] 杨星映.论中国古代美学元范畴“气”[J].中国文学批评,2017(1):51-60.
- [44] 冀志强.意象非美——关于意象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98-105.
- [45] 李天道,魏春艳.司马相如赋作的地域文化心态与美学精神[J].中国文学批评,2017(2):49-62.
- [46] 刘启涛,王琨,李骞.论当代大凉山彝族汉语诗歌的原生态美学精神[J].中国文学批评,2017(2):78-87.
- [47] 毛宣国.汉字与中华美学精神[J].中国文学批评,2017(3):5-12.
- [48] 曾繁仁.笔的生命之舞——书法美学概论[J].文学评论,2017(5):28-36.
- [49] 史红.中国服饰与中华美学精神[J].中国文学批评,2017(4):69-82.
- [50] 易冬冬.中国传统礼仪中的美学问题[J].文艺研究,2017(11):22-30.
- [51] 高建平.关于中华美学精神建设的思考[J].社会科学战线,2017(2):165-172.
- [52] 朱志荣.论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性[J].文艺争鸣,2017(7):105-108.
- [53] 曾繁仁.中西对话中的中国生态美学[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185-191.
- [54] 陈雪虎.“史、论、释”:中国古文论研究的理论自觉[J].南京社会科学,2017(5):111-118.
- [55] 毛宣国.古代文论“进入”当代的理论思考[J].中国文艺评论,2017(9):52-62.
- [56] 潘链钰.返道·立本·致用·诗性——中国文论建构的四个关键词思考[J].中国文学批评,2017(3):19-24.
- [57] 南帆.文学理论能够关注什么?[J].文艺争鸣,2017(8):96-99.
- [58] 周宪.视觉建构、视觉表征与视觉性——视觉文化三个核心概念的考察[J].文学评论,2017(3):17-24.
- [59] 周志强.声音与“听觉中心主义”——三种声音景观的文化政治[J].文艺研究,2017(11):97-102.
- [60] 刘连杰.触觉文化还是听觉文化:也谈视觉文化之后[J].文艺理论研究,2017(3):172-181.
- [61] 单小曦.新媒介文艺批评及“媒介说”文艺观的出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6):116-125.
- [62] 欧阳友权,喻蕾.网络文学批评史的问题论域[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43-148.
- [63] 陈定家.试论新媒介文化的批评标准与叙事逻辑[J].中州学刊,2017(3):149-155.
- [64] 陈海.当代美学的技术挑战及出路[J].中国文艺评论,2017(3):22-27.
- [65] 牛鸿英.虚拟现实技术条件下传统美学的当代进路[J].中国文艺评论,2017(3):13-21.

To Break the Old Fences and Move towards a New Era

—A research o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2017

LIU Zhi-b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20, China)

Abstract: In 2017,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as moving towards a new era, through breaking the old and establishing the new. This process can be described in 4 ways: (1) to make a clear judgment on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develop theories and cultures in dialogue, play a prelude to the new era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2) to put forward public hermeneutics after breaking the shackles of imposed interpretation and theory centralism, make a new step towards constructing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3) to carry on and promote traditional aesthetic spirit, or to discover and utilize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make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find its origin; (4) to examine literature in social and cultura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make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ake root in an open academic context. Guided by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e should believe in the standard valu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the origin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dialogue value of foreign cultures, and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should be constructed in open and plural ways in the new era.

01Key words: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ialogue; public hermeneutics; a new era